

#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张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学术研究方法;资料收集;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2-0020-04

《史记》是以“实录”著称的史传文学名著,《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第一篇,通过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取舍梳理,首次勾勒上古史的优美画卷。在对纷繁芜杂的神话传说片段的钩稽整理中,司马迁依然能够秉持“实录”原则,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以及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之外<sup>[1]</sup>,也深受孔子的影响<sup>[2]</sup>。此外,还与司马迁科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论赞对黄帝历史材料的取舍以及取舍材料的衡量尺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充分体现了司马迁

严谨的治史态度,为全书历史材料的取舍确立了一条总纲领。此外,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司马迁科学的研究方法。

## 一、资料收集的广博性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由此可知,《史记》的撰写主要以六经记载为主,兼及百家杂说。然而,其所涉及资料远非这些。张大可将《史记》中涉及的104种书籍分为4个部分:六经及其训解书(23种);诸子百家书(50种);古今历史书及汉室档案(24种);文学书(7种)<sup>[3]</sup>。由此可知,司马迁所谓“百家”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说的“诸子百家”的范畴而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诸子百家书中有关上古神话传说的记载,而且还有对文学书以及汉室档案和历史书的整理。

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在对黄帝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司马迁参阅了广义的诸子百家书籍,得出了“其文不雅驯”的结论。而“孔子所传宰予问

收稿日期:2013-11-04

基金项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才科技基金项目(DB1101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年科技基金项目(QN1444)

作者简介:张华(1984-),男,山东泰安人,讲师,文学博士。

《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则包含了两层含义：对儒者所云比较熟悉，即对于儒家经典资料的收集；对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也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所以，司马迁在收集资料时，除了汉代公认的儒家经典之外，对于当时冷僻且多不传学的“非圣人之言”也不放过，体现了其穷尽材料的严谨撰述态度。

资料收集的广博性需要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必备的客观条件，这与司马迁的撰述宗旨、丰富的求学经历以及太史公一职的便利条件息息相关。

第一，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4]</sup>。这就客观上要求其博览古今文献典籍，以探讨天地古今的奥秘。《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这一撰述宗旨必然要求司马迁广博地收集文献资料。

第二，司马迁有着丰富的游学经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里的“董生”就是指董仲舒。司马迁向他学习过《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功底。《古文尚书》是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的主要参考书，但《古文尚书》在当时尚未被立为学官。《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sup>[4]</sup>这一经历对司马迁跳出当时狭隘的经学窠臼产生了重要影响。董仲舒的公羊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大讲灾异吉祥之说，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潮，尤其是邹衍和董仲舒的五行说对司马迁取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思想史上看，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氏族宗教气氛”。“所谓普遍性的氏族宗教气氛，即在于以神化先王为前提，以天人感应为内容。这就是搢绅先生和儒者的职业的构成部分。”<sup>[56]</sup>这种氏族宗教气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中断。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宗教气氛，将视野扩大到关乎“天人之际”的各个

领域。

第三，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一职，为其参阅大量文献典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舐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天下典籍都集中在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金匮石室之中，为司马迁博览各类典籍，收集各类文献资料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 二、田野调查的广泛性

司马迁对六经及百家的记载，也不是随意取用的，而是经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得出“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的结论。由此可见，司马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以便更加深入地验证文献资料。通过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关于司马迁田野调查的途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史记·周本纪》：“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蒙恬列传》载：“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当时学者的错误认识，体现其不迷信古人、严谨求实的治史精神。

第二，接触当事人或他人口述材料。《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史记·五帝本纪》写道“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司马迁十分重视“先人”、“长老”的口述材料，将其与正式文献资料综合推敲，对历史事件得出确切的解释。

第三，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其中有乐府歌谣、文人诗赋、民歌童谣以及俚语俗谚，如伯夷叔齐《采薇之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民歌生动形象、质朴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内心思想，也从侧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这些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在太史公笔下穿插得当、运用自如，为叙述远古历史提供了生动形象而不乏真实性的佐证，也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

第四，参照文物和图像。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社会，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是从远古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它们几乎成了当时不可缺少的主题或题

材,汉代画像砖上有伏羲、女娲蛇首人身以及西王母、东王公的传说和形象,以及双臂化为两翼的不死仙人王子乔,各种奇禽怪兽、赤兔金乌……,“它们并不是以表面的动物世界的形象,相反,而是以动物为符号或象征的神话——巫术世界来作为艺术内容和审美对象的。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西汉艺术展示给我们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天上、人间和地下在这里连成一气,混而不分。”司马迁生活在这种艺术氛围中,无可避免地要接触一些文物图像等材料。这对于其印证文献记载大有裨益。《史记·留侯世家》中谈到司马迁自己见到了张良的图像“状貌如妇人好女”,而改正了原以为其人“魁梧奇伟”的想像。

### 三、甄别选材的严谨性

司马迁甄别、选材的严谨性,主要体现在运用了比较研究的考证方法。将《春秋》、《国语》与《五帝德》、《帝系姓》相互印证,取六经而不拘泥于六经,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篇》中说:“六经皆史也。”<sup>[7]</sup>在汉代以前,六经就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的知识渊藪和真理依据。徐旭升对神话流传的作用阐释道:“由于人智的进化,知道了神话的不可靠,就逐渐把古史传说加以修正,加以‘人化’对于古史资料其他不可靠的部分也渐渐地怀疑,并且加以严格的批判。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怀疑和批判的对象全是部分的,他们所作的是修正或补正的工作,经的最高权威在基本上没有动摇,传说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部分古史资料,在经典的荫底下,在前两千年间的人的心目中,是比将来正史中所载史实更可靠的。”<sup>[8]</sup>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学者载籍极博,必取信于六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六经的所长一一加以说明:“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即便如此,司马迁还是对于六经所载有所保留地选用。我们对照《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即可

看出。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五帝本纪》虽然多取自《大戴礼记·五帝德》,但详细对照来看,这两篇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司马迁把《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的一些神异的记述删除了,如“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扈云”、“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可见司马迁对儒家经典也是经过详细考察的,并非全盘借用,认为“不雅驯”的内容也会加以摒弃。除《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姓》之外,司马迁还广泛吸纳其他诸子言论,关于蚩尤的一段,《大戴礼记·五帝德》没有记载,而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类似记述。“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又带有邹衍、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影子。这些都是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的结果,如此极大地丰富了上古史的内容,使之更加凸显其独特的魅力。

### 四、研究思考的深入性

司马迁研究思考的深入性是在前面工作基础上的大总结和大综合,没有广博的材料、广泛的调查、严密的分析,是很难做到的。《史记·五帝本纪》首起黄帝,确立“大一统”主旨,对于零散而不系统的上古神话传说进行取舍增删,化古奥为通俗,最终一以贯之、连缀成文,尤能体现这一点。

首起黄帝,体现“大一统”思想。《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么一段关于黄帝的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筮。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这段文字纵横捭阖,有如大江大河一泻而下,写疆域之广、物色之繁、气势恢弘、情势雄壮,颇有汉大赋的宏伟气概。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发现,黄帝由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人物走下神坛,成为一位人间帝王。以黄帝为代表的古圣先王在上古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修德振兵”,讨伐不臣之臣,致力于统一大业,或“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治理社会,大到统一疆土、教化黎民,小到“淳化鸟兽虫蛾”刻画出一个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帝王形象。帝高阳颡顛、帝高辛帝誉、乃至唐尧、虞舜

等都是如此,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古圣先王在中华民族统一和文明发展史上的赫赫之功,他们的事迹在司马迁笔下呈现出“大美”的气象和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美学特征。以黄帝作为开端正是契合了汉代宣传“大一统”、歌颂“大一统”的时代需要。将黄帝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则是司马迁深入思考而做出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对经典的变化采用,化古奥为通俗。《史记·五帝本纪》曰:“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毳。申命和叔……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这段记载与《尚书·尧典》仅数字之差,显然是由《尚书·尧典》变化而来的。又如《史记·五帝本纪》:“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尚书》作“试可乃已”。《史记会注考证》引钱大昕语曰:“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也。”司马迁增“不”字即作了口语翻译,其义显明,否则就会造成误解。《史记》引据经典,将古奥难懂的古文字译为当时通用语言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例不胜枚举。这也是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一个方面。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严密的逻辑

思维,进行深入地研究思考,司马迁才于浩瀚繁杂的先秦典籍中,梳理出上古史的脉络,并且在这一脉络中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史记·五帝本纪》的撰写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其中资料收集的广博性、逻辑思维的严密性、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几个方面,至今是学者治学的必经之路,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张华. 人神之际多元互动下的“实录”坚守: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的原因探析[J]. 中华文化论坛, 2011(2):124-131.
- [2] 张华. 论孔子对司马迁取舍运用上古神话传说的沾溉[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8(1):136-140.
- [3] 张大可. 史记文献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
- [4]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5]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 中国思想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 [6]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 [7]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8]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of SIMA Qian from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Shih Chi*

ZHANG 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s the beginning of *Shih Chi*,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known as “the first official biographic sketches”, has alway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and high academic evaluation.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can embody SIMA Qian’s ideas about veritable records and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his broader data collection, the universality of field survey, the rigor of materials selection, and the deep research thinking, etc. SIMA Qian’s idea about veritable records not only shows his attitude about factual writing and recording history, but also embodies his strict truth-seeking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ll these still provide profound implication for today’s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SIMA Qian;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of Shih Ci*;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 data collection; field survey